

唐 代 饮 茶 风 习

马 忠 民

我国饮茶的历史十分悠久，距今千多年前已经开始，或可追溯更远。“周礼”记周代祭祀用茶，“晏子春秋”记齐国晏婴“食茗菜”。^①《神农本草》称久服茶茗，“令人有力悦志”。人或以为神农时代就知道饮茶，恐未必如此。俗传神农氏尝百草，知药味。根据这传说推想神农氏已尝过茶，辨别了茶的性味，并不是毫无可能，只是这传说和记载，时代绵邈，难于考索，后人所述又不足深信。汉代以后，有关饮茶的记载量多而翔实，我们说饮茶历史悠久，可算“信而有徵”。

魏晋南北朝时期，爱好饮茶的人已经不少，^②当时饮茶者多是社会上层人物，饮茶风气南方盛于北方。北方甚少有人知道饮茶。对饮茶的功用，少数人用作宴会待客，多数人鄙视为药物。从历史意义来说，是一个茶史发展阶段。那时，饮茶作为维生药物的意义远比作为社交饮用品的意义还要大。

隋唐以来，尤其是盛唐以后，饮茶已蔚然成风，瀰漫全国。唐代后期，“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③茶的产地随唐代初期农业生产的发展已泛及南方广大地区。昔日少于饮茶的北方，在茶叶的运输、贸易、市肆方面都大大发展。各阶层人物可凭自己需要随处饮茶。饮茶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生活所必需，深有社会化的意义。它

成为社会交际的媒介物，是高人雅士的标志，是达官贵人醒酒去腻的清心汤，是“贩夫走卒”解渴止累的凉饮剂……。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们的思想意识、人生态度、物质需要都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前人对唐代饮茶风习的瀰漫已有所论及，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这风习颇有鲜明体现。

唐人陆羽说茶是“南方的嘉木”，在巴山峡州地区且有两人合抱的茶树。他列举了当时茶品产地，产地泛及长江中下游和岭南道的恩、播、费、夷等十一个偏远的州。这些偏远州有些什么产品，虽说“未详”，却称“往往得之，其味极佳”。^④陆羽的足迹并未遍及天下，他的《茶经》也不可能尽载当时茶品及产区。宋朝人就曾批评陆羽对“建茶”阙于记载，认为他没有到过福建所以得不到极品。^⑤大抵草木珍异，一时未为人所知，并不等于不存在。世上的事又何尝不是如此？陆羽没有见到，难免有人知道。我们仅就《茶经》所载，足见产茶区实为广大，这当是唐代饮茶风习之所以瀰漫的一个重要因素。

《茶经》记唐代饮茶盛况，说：“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为比屋之饮。”作者身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

朝,《茶经》成书约在上元至建中之间(公元760年——780年),书中所记反映了开元、天宝以至建中时期(约当公元713——780年)的现状。此“两都”指“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荆”在今湖北江陵一带,“渝”在今四川重庆东北一带,都是盛产茶叶的南方地区。饮茶之风,在“荆”、“渝”早已形成,“两都”是昔日饮茶甚少的“北方地区”,这时却与荆、渝同样饮茶成风,作“比屋之饮”了。

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有《饮茶》一条,很可籍以说明唐代饮茶风习的发展及其盛况,节引如下:

“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一本无此二字)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倣效,逐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集,色额甚多。

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

《封氏闻见记》记载可信,它“语必徵实”,^①此《饮茶》条所记反映的是开元到贞元间关于饮茶的真实情况。从此段记录里我们可以注意到:

一是南方人好饮茶,北方人初不多饮。开元以后饮茶成风;古人亦饮茶,但不如唐

人的溺爱;唐人饮茶风习并传到塞外。^②二是从开元佛教大兴,听众用茶减寐,人们得以随处饮茶,因而成俗;饮茶可提神刺激的药性作用大有助于饮茶成风。三是由个人携茶煮饮进而开设茶铺,人们投钱取饮,饮茶已商品化;取饮者又不论道俗人众,饮茶更社会化。^③四是茶的运输,由南方向北方航运;北方广大地区包括京城和河北、山东的许多城镇都有卖茶店铺,茶的品种繁多,数量巨大,水陆运输不绝。五是由于人们宣扬,煎茶炙茶饮茶都很讲究方法;制茶饮茶的器具多达二十四种,形成套数。以至“茶道”流行;饮茶一事且在王公朝士等上层社会人物之间成为风尚。凡此等等,可以说明唐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行业,即使各人意识不同,态度有异,但多已卷入甚而沉溺于此瀰漫全国的饮茶风习中。

瀰漫的饮茶风习,影响所及,在实际生活中有具体的表现,择其数点,略述如下:

一

北方地区开设店肆和用以“穷日尽夜”、“比屋饮之”所需的茶时,由陆路和江淮水路运输而来。我们尽可想像到那南北交通线上不断往来的车船和各色各样茶叶“堆集如山”是一幅多么繁荣的景象。在其间,多少人在运输、交易及一切有关饮茶的生产活动中生活着、竞存着!

贞元大历年间,江淮航运如何?史载:江中帆樯如织,船的载重量多至八九千石,有的多至万石。俞大娘的船就是其一。舟人以船为家,世代住在船中,养生送死婚嫁也都在船中,有的船舶操驾之工多达数百,他们的船舶“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大”。这航线就是当时南北交通的江淮内河航线。唐代的内河水运与海外贸易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同等的重要性,

都起着重要作用。所谓“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舟船之盛、尽于江西”，不容忽视。俞大娘和其他人的大船就往来在这条江西到淮南的经济动脉上。江西为当时南方航船麇集和商品贸易的中心，浮梁且是个茶叶贸易的集散地，^⑨那往来南北的大船，中多富商，他们呼奴使婢、鲜衣美食，身居船楼之中尽情享受那歌弦檀板、清音妙绝的奢侈生活。^⑩

中唐迄于唐末，从事茶茗贸易而往来江淮间的商人不停地把南茶北运，对南北航运线上的商业城市的繁荣增添不少色泽。广陵有数百富商大贾，茶商即属其一。唐人罗隐曾谈过一个名叫吕瓚的鄱阳人就是个长期居住在扬州（广陵）而往来运销茶茗的商人。罗隐说：“瓚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江，时四方无事，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⑪广陵即扬州，是唐代国内外的著名商埠，曾有“扬一益二”的谚语，^⑫人且以为“人生只合扬州死”，正因它是“歌钟之地”，其繁荣无待细说。扬州北经淮水至于汴州。汴州为通往齐、鲁、洛阳的交通要道，是枢纽，也是货物集散地。茶茗由江淮而北以此吞吐，王建寄诗有“水门向晚茶商斗，桥市通宵酒客行”的话，正是茶茗水运北上在汴州运销的写照。

这期间，茶饮成俗对社会生活关系何等密切！

二

中唐以后，有关饮茶的新事物迭有出现，有所发展，有如唐代的时装一样给人们以新兴递进的鲜明感觉。这为唐人社会生活增添不少新颖内容。

封演说陆羽造“茶具”二十四事，替人煎茶时“随具而入，教摊如（常）伯熊故事。”也说常伯熊“手执茶器，口通茶名”，

对“茶具”、“茶器”作同物异称；陆羽把“茶具”指为采茶制茶的篮、灶、甑、杵等，把“茶器”指为煎茶炙茶的风炉、铤、碾、瓢、竹筴、醴盏、盃等，是把“茶具”、“茶器”分别指称。实际上，封演所说陆羽的“具”就是常伯熊的“器”，也就是“茶经”中的“器”。我们认为总的是指煎饮之器具，也可称之为“茶具”或“茶器”。其中之一为“盃”。

“盃”是当今人们所熟知的，唐人记事和诗歌中经常提到，日常生活已离不了它。“盃”也称“杯”（“栖”），或称“瓿”，《因话录》记兵部员外郎李约天“性嗜茶，能自煎”，“客至，不限瓿数，竟日手执茶器”；“梦馀录”记一个年纪已一百三十多岁的老僧称自己“惟嗜茶，凡履处惟茶是求，或遇百椀不以为厌”。这老僧的“椀”与李约天的“瓿”都是同物异称的“茶器”。唐代诗人用“盃”、“瓿”、“杯”形于咏吟的甚多，不妨略引数条以见饮茶及茶器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此处置绳床，傍边洗茶器，白瓷瓿甚洁，红炉炭方炽”。（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州》）

“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盃，寄与爱茶人”。（白居易《山泉煎茶有怀》。）

“满瓿似乳堪持甌，况是春深酒渴人”。（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

“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满盃花”。（刘禹锡《尝茶》。）

“越椀初盛蜀茗新，薄云深处搅来匀”。（施肩吾《蜀茗词》。）

“一瓿拂昏寐，襟鬲开烦拏”。（李群玉《龙山人惠石廩茶》。）

“满火芳香碾麴塵，吴瓿湘水绿花新”。（李群玉《答友寄新茗》。）

“耽书病酒两多情，坐对闽瓿睡先

足”。（秦韬玉《采茶歌》。）

“借问王孙草，何时泛椀花”。

（皇甫冉《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

“昨日东风吹枳花，酒醒春一晚
椀茶”。（李郢《酬友人春暮寄枳
椀茶》。）

“入座半瓿轻浮绿，开缄数片浅含
黄”。（郑谷《峡中尝茶》。）

“景物残三月，登楼枪一杯”。

（杜牧《题宜兴茶山》。）

诗句多说“瓿”、“盃”（椀），少数说“杯”。这种茶器，唐代已用瓷（瓷、磁）制作。所谓“越椀”、“吴瓿”、“闽瓿”，指在越、吴闽等地出产的瓷茶器。唐代瓷器的发展与饮茶的风习的瀰漫有密切关系，两者互相推动，而饮茶对瓷器的发展推动尤甚。诗中的“越椀”，是当时著名的越州瓷瓿。与陆羽同时的诗人顾况曾形容它为“越泥似玉之瓿”，^⑮言其色如碧玉。白居易诗中的“白瓷瓿”，是唐代邢州所产，唐人称内丘（在邢州）的“白瓷瓿”，和端溪的“紫砚”一样，“天下无贵贱通用之。”^⑯越瓷瓿较名贵，白瓷瓿大众化，对饮茶风习扩大更有影响。

近些年来地下出土的古器物，中有唐代的瓷茶椀和茶壶。河南安阳小屯村展出好几种出土的隋朝青瓷茶盘和茶杯，一个茶杯口大如今饭椀，其余较小，一如今之无耳茶杯，瓷色白，类似唐人诗中的瓷盃，唐代实物不见，但洛阳展出唐代彩釉茶杯，形制倒也很像今天的茶杯。长沙亦见唐代三彩釉茶杯，形制与洛阳相同。这些出土瓷、陶茶杯，是否即是唐人诗歌中的白瓷椀的实证还难以肯定，但把它们作为实物来与诗文对证，可以使人对唐代饮茶风习与民生用品的关系得到具体而鲜明的印象。

从“茶盃”谈到“茶托子”。

“茶托子”的出现和发展，也因饮茶而起。那是陆羽的二十四种以外的茶具。它用

以衬垫茶盃，又称“茶船”，据说始于建中年间崔宁之女。（建中约当公元780—784年之间。）“茶托子”的出现，由于“茶盃（杯）无衬，病其熨手，取碟子承之。”又由于饮茶时，盃在碟中不稳定，“乃以腊环碟中央，甚盃遂定”。这样作了初步的改进和发展，这显然出于饮茶方便的需要。“椀”当即“碟”，《宋史·吕蒙传》：“吾面不过碟子大”一语，可以推知唐人碟子的大小也不致超过人面。前面说的出土隋唐瓷盘，中置茶杯茶盃，那盘也该就是“椀”（碟），它可能是崔氏女以前真正的“茶托子”。不过形制不全相同。崔氏“茶托子”初加“腊环”，后用“漆环代腊”，后来“茶托子”由此名门士族之家流传到社会上，以群众的智慧，得到改进创新。所以“其后传者，更环其底，以为百状焉”。成为各式各样而底部作环形固定，用以垫衬茶杯的一种通行茶具了。贞元初期（约当公元785—795年之间）在“青州犹绘为椀形，以衬茶椀，别为一家之样”，^⑰在《资暇录》里，“犹绘为椀形”写为“油绘为荷叶形”，“油”字可能讹误，“犹”字较为恰当。这就是说，在贞元年间，青州郚州地区仍有绘制成椀形（船形或人面形）或荷叶形而用以衬托茶碗的茶具，是自成一家的样式，有人即使不叫它“托子”，总还是一种茶具。它还保持早期的形状，与改进发展了为“更环其底”的“茶托子”，区别在于它还保持船形或荷叶形。

再谈也因饮茶而起的“御史茶瓶”和“茶瓶厅”：

“御史茶瓶”和“茶瓶厅”这些名称，标志着饮茶出现的新事物，也可视为一时时髦的称呼。那是唐代会昌时代的事。（约当公元841—846年），如说：

“御史三院，一曰合院，其僚曰侍御史。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三曰察院，其僚曰监察御史。”

察院厅居南，会昌初，监察御史郑路所葺；礼察厅谓之“松厅”，厅南有古松也；刑察厅谓之“魔厅”，寝于此多梦魔也；兵察厅掌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御史恭亲监启，故谓之，御史茶瓶。”^⑩

那御史台下属的察院，有“松厅”、“魔厅”，都得名有故，如因“松”因“魔”。但此并未说明兵察厅因某种事物而得某名。只记载了兵察厅掌中茶，中有陶器贮茶、陶器由御史监启，称之为“御史茶瓶”。《唐语林》有一段关于察院的记载，谈到兵察厅，说：“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御史恭亲监启，故谓之‘茶瓶厅’。”^⑪这就清楚指明兵察厅另有“茶瓶厅”的名称，一如“松厅”、“魔厅”般，名有来由了。也如吏察厅因为主管入朝者的次第名籍而称之为“朝簿厅”一样，因为有“茶瓶”和御史管开启，才产生“茶瓶厅”和“御史茶瓶”的雅号。如此重要的政府官僚机构，竟因“茶”而命名，一件区区茶器，竟受到这样重视，如此管理，得此雅号，饮茶风习的影响何等深远广大！

其他有关茶事的新名词和事物，如“茶博士”、“茶偶人”、“茶神”、“闻茶”、“茗战”、“茶粥”……，都因饮茶风习而起，名目繁多，内容不少，在此不必烦言了。

三

茶以清凉爽口的饮料被唐人用作社交媒介物。随社会经济发展日益泛行于各阶层人物之间。早先，饮茶多作药用，有人以为第五第六世纪是药用与社交用的分界时期，实则不然。在此之前确已用于宾客宴会，在此之后仍不乏有人当作药用。唐人有以为饮茶“可攻肉食之羶膩，滌通宵之昏寐”。^⑫有

的说“饮以滌烦”，^⑬有的又说“释滞消壅”，^⑭饮茶确有许多益处，古人所谓“延年益寿”、“轻身不老”、“除瘡去病”，“益人清思”，也有科学根据，合乎今日对茶作化学成分分析的结果。茶作药用并不严受时代限制，唐代中叶，以茶用于社会交际标志着它在唐代社会生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时，它已取代药用而成为主流了。

《群芳谱》引权紆文论隋文帝微时，脑痛，忽遇人告诉他山中有“茗草”，煮而服之，痛当愈。“帝服之有效，繇是人竞采啜”。这记载，可以证明饮茶药用，却不可籍以证明药用到此时为限。这是不得不附此说明的。

茶茗的交际作用，确有明确反映。其如僧侣待客、名士文人往来，以至于娼寮、贪官间的酬酢、奉迎所表现的例证，不难撷拾，无须烦引。在此略记数事以见一般：

宪宗元和中，定水寺的院僧命弟子“煮新茗待客”，客中一秀才不唯不得茶饮，院僧还嘱弟子：“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余茶饮之。”所以如此，由于院僧以为秀才是个“不逞之徒”。^⑮交际场中如此看人待客，语意如此轻侮，“茶味”所含的社会意义多么浓厚而深刻！

唐文宗宣宗召见文士，多用“茶汤”招待，“唐语林”记文宗召学士到内廷讲经，较量文章，“官人已下侍茶汤饮馔”；记宣宗暇日召翰林学士韦澳入宫谈论诗篇，“小黄门置茶床”招待茶饮。唐天子把茶汤作饮料用在讲经、论文、谈诗之间，并不止于把“新茶”赐给王公、贵臣作为显示其“恩渥”的赠品而已。

茶用为餽贈的礼品，诗人多有诗文记载。白居易深喜亲友寄贈的“蜀茶”、“毗陵茶”；卢同收得谢谏议所寄新茶；李德裕得人贈予数角新茶，都心情愉悦，笔之于诗。茶茗贈遺，自为当时社会交际的媒介物。

还有这样的事：会昌年间，有称之为“朝士”的那种贵人角色，同游僧舍。偷偷看到僧人有“殷红牡丹”，便使人把僧人骗到曲江，另派人入僧舍把名花窃夺，却“留金三十两，蜀茶二斤”作为“偿价”。^②这种丑恶行径，固然可恨，勿须多说，只是由此可见“蜀茶”既不是赠品，又不是待客之物，倒直象与货币同样作用的商品交换媒介物了，可算是茶茗广泛用于社交的社会现实所反映的一种特殊形式吧！

至此，可收结了。总之，唐代饮茶风习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具有划时代意义。以上所述影响之外，有关“茶道”与对外文化交流，僧侣诗人与隐逸之士和饮茶嗜好，古代茶马贸易，以至唐代榷茶、贡茶，茶农与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等，都是重要问题，影响深远，另文叙述，不再涉言了。

注：

- ① 晏婴食茗菜，有“茗”，该是茶，“茗菜”是菜或是茗，尚难确定，这里姑用一般说法。解作茶。
- ② 人物很多，不一一列举，如晋的司徒长史王濛就是其一，见《说郛》及《御览》引《世说》。魏晋南北朝饮茶之盛，拙作《我国茶饮起始和古人对饮茶功用的认识及实践》一文有所详述。
- ③ 李启《国史补》。书中并列举茶的品名甚多，如剑南的蒙顶石花，湖州顾渚的紫笋，峡州的碧涧、明月等，福州方山的露牙，常州义兴的紫笋、蕲洲蕲

门的团黄，名品还多，地区也广，还说“而浮梁之商货不与焉。”

- ④ 见陆羽“茶经”。
- ⑤ 宋黄儒（字道辅）《品茶要录》、以为陆羽所知者，乃宋人称“草茶”者。并说“鸿渐未尝到建安欤？”《画境录》也有类似的说法。
- ⑥ 《四库总目提要》语。
- ⑦ 《唐国史补》说常鲁公出使吐蕃。赞普以茶示常。赞普的茶，有寿州、舒州、顾渚、蕲门、昌明。涇湖等地出产名茶。是吐蕃已传入饮茶风习，而且可见内地茶叶已远输塞外；塞外茶风习，非独传至回纥。
- ⑧ 《因话录》谓“至今鬻茶之家陶为其（指陆羽）像”置于场器之间，云宜茶足利。”可参见茶铺卖茶家多设法赚取利润，茶饮已商品化。
- ⑨ 《白氏长庆集》中《琵琶行》，记茶商“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在今江西景德镇，是茶叶集散地，也是当时江西的航运中心。
- ⑩ 以上所述引文，参见《唐语林》卷八。及《国史补》下。
- ⑪ 见《广陵妖乱志》。
- ⑫ 见《全唐诗》、《盐铁谚》。
- ⑬ 顾况《茶赋》。
- ⑭ 见《李启国史补》。
- ⑮ 以上引论参见《唐语林》及其注。
- ⑯ 《御史台记》。
- ⑰ 亦见《因话录》卷五。
- ⑱ 顾况《茶赋》。
- ⑲ 刘禹锡《代武中丞谢新茶表》。
- ⑳ 母斐《茶经序》。
- ㉑ 见薛昭蕴《幻影传》。
- ㉒ 见《唐语林》。

~~~~~

（上接68页）术形象的具体分析，能够充分地说明：列宁同志七十年前关于托尔斯泰由贵族地主转变为宗法制农民的代表论断，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有充分根据的，渗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一科学的论断，既把作家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考察，又把他的主观因素作了具体的分析，是辩证法的圆熟的运用，是唯物论反映论的生动体现，他为我们评价古典作家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 注：

- ①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299页。
- ② 以下均同上书②291页。⑦298—299页。⑧312—313页。⑨298页⑩、⑪、⑫299页。⑬290页。⑭299—300页。⑰315页。⑱、⑲300页。⑳285页。㉑286页。㉒283页。
- ③ 高尔基著：《俄国文学史》，缪灵珠译 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487页。
- ④ 卢那察尔斯基著：《论文学》，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269页。以下均同上书⑤274页。⑥265页。⑦272页。
- ⑤ 没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安娜·卡列尼娜》，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